



# 约翰·柯顿：G20 的“第三只眼睛”

■文/复旦大学直研生陆诗怡 英国杜伦大学本科生施文律

1960年代，美苏冷战下的国际局势颇为动荡。1960年，17个非洲国家独立，以巴发生第三次中东战争；1961年，柏林墙筑起；1964年，越战更为白热化，肯尼迪政府持续投入50万美军进入战场……回忆起少年时光，柯顿戏称自己是标准的“土豆沙发”，“我常在电视机前看各种国际新闻，第三世界的民族独立运动伴随着冷战后各类局部战争，吸引着我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法国后现代大师德里达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事，动摇、改变了世界的根基”。而对柯顿而言，这个神奇而重要的时代同样也在他个人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柯顿对于本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和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均起源于少时那个小小的铁皮盒子所展示给他的世界。四十余年来，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中心联合主任柯顿教授所做的，就是对他所好奇的世界的不懈探索。

## 政治学者：天生的兴趣、独立的思考

1948年，柯顿出生在多伦多一个十分重视教育的家庭，他的母亲是一名教师，两个双胞胎姐姐也从事教育行业。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柯顿从小就培养了对于已知进行考证和对未知进行探索的精神。

### 高中老师醍醐灌顶点明方向

“但是对我而言，真正指导我走向政治研究和国际关系道路的是我的高中老师”，谈起这位有知遇之恩的老师，已接近“从心所欲不逾矩”年龄的柯顿，在越洋视频采访的屏幕上，依旧露出了毕恭毕敬的神情。在高中时期，柯顿在英语班上的成绩虽然一直名列前茅，但他始终对于自己将来是否该从事学术研究、进而从事何种研究举棋不定。“一直以来，我都知道自己很聪明，但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是模糊的。”直到高中英语老师告诉他，“你必须要去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攻读政治科学专业”，柯顿才茅塞顿开。在高中毕业典礼上，作为优秀学生代表的他引用了查尔斯·珀西·斯诺的名言，“对未知的求索是人类最大的财富”，英语老师成了引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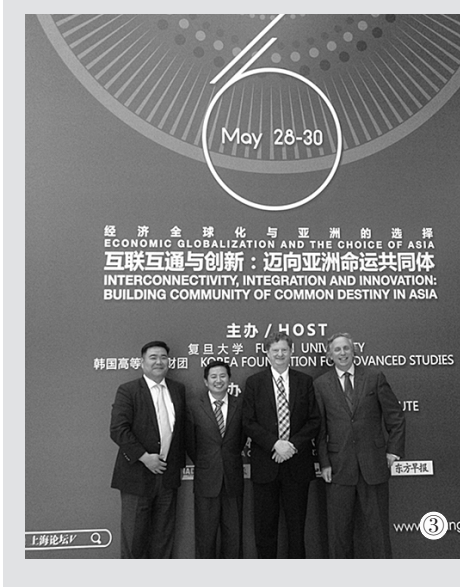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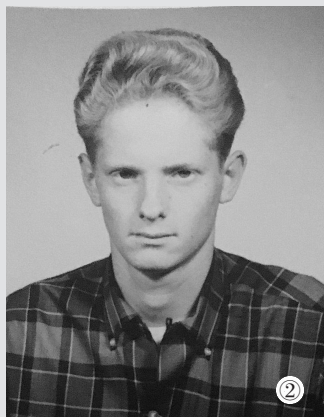
### 对美国孤立主义满怀失望

在卡尔顿大学研读国际事务并完成硕士学业后，柯顿决心拓展他的政治视野，将目光转向了美国。怀着憧憬之心，柯顿申请了在国际事务方面卓有成就和美誉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继续博士的求学。他希望在首都的三年求学中能接触到更全面的信息，结识到更多专家。然而，他失望了。与美国同学、教授和政治专家的交流中，柯顿意识到了美国孤立主义和例外优越论的盛行，这让柯顿再次陷入了困惑之中。美国几十年来的霸权国际地位与实力竟是基于如此中心主义的荒诞自傲上。“美国是与世界分裂的，根本谈不上全球性的美国”，柯顿这样评价。

然而，对于美国理念的失望、困惑和无奈并没有削减柯顿对于政治科学的热爱。相反，柯顿想为国际体系做贡献的理想愈发坚定。在反复的学习、对比和分析后，柯顿发现提倡自由主义的母国加拿大始终将自己放在全球体系里，“加拿大的土壤更适合培育出成熟并中立的政治思想，也更符合国际社会全球治理的方向和趋势”。体悟到美国和加拿大的根本差异之后，柯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加拿大外交政策的研究，并返回母校多伦多大学的蒙克全球事务学院任教。

### 对约瑟夫·奈的“相对脆弱性”的思考

1971年的一天，在卡尔顿大学读硕士的约翰·柯



①柯顿参加2015土耳其G20峰会

②高中时期的柯顿

③柯顿(左三)与朱杰进(左二)五月参加“2016上海论坛”

④柯顿的书橱摆放的都是全球治理与国际事务领域的书籍

顿参加了著名新自由主义代表约瑟夫·奈主讲的校级研讨会。在会上，奈侃侃而谈自己的学术思想，并且向参加研讨会的人深度解释了在自己和罗伯特·基欧汉撰写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的重点概念。听完研讨会后，柯顿对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权力相争和合作配合产生了无数的问号。为何会相争？又为何会妥协于利益纷争而选择合作？奈的“相互依赖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柯顿始终认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虽能解释部分权力相争和相依的现象，但似乎仍缺失了什么。1977年，29岁的柯顿再次参加了奈作为嘉宾的一次非政治对话座谈会。在那次会议上，奈用“软实力”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思想。然而，引起柯顿沉思并启发他自己理论思想的并不是这个风靡世界至今的“软实力”的概念，而是奈无意中说出的一组词，即“相对脆弱性”。

顺着这一概念的逻辑，柯顿总结出了自己对于国家“共同脆弱性”的观点。结合1997年和2007年开始的两次金融危机、2001年的“911事件”等非传统国家安全威胁，柯顿意识到危机动荡后暴露的国家共有“脆弱性”可以催生并促进全球治理和全球合作的国际理念。由奈所忽视的“相对脆弱性”，柯顿发展了“共同脆弱性”。在不断的思考辨析中，柯顿走出了自己的独立研究之路，也为他日后研究G7和G20奠定了理念雏形。

### 建言监督者：两种角色同一功能

11年后，不惑之年的柯顿在多伦多大学潜心研究国际组织等相关领域。1988年，加拿大被任命成为第十四届G7峰会主席国，并且由当时的总理马丁·马尔罗尼主持会议。为了配合贸易失衡、外汇汇率急剧波动和发展中国家债务等主要议题，多伦多大学作为加拿大一流大学与政府合办了一系列的准备会议，这使柯顿有机遇上研究G7与G20的道路。

### 建G7研究中心，确立两种角色

外交部在多伦多多的准备会议中一度提议建立一

好友 Alan Alexandroff 曾在媒体前这样评论柯顿：“约翰一直都是约翰，他对这份研究的热爱从没有消失过”。

### 创“问责监督报告”这只无形的手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体系参与者的扩张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促使柯顿创立了G20研究中心。结合了自己在G7研究中心二十余年的成熟经验，柯顿发现G20虽然比西方社会主导的G7更具民主性，但其论坛和协议依然没有法律约束力。“我想要探索的是，会议中的共识是否能融入到各国政策中”，柯顿如是说。出于对于各国承诺兑现率的好奇，柯顿不断发展1996年开始制作的问责监督报告，使其成为了G20研究中心最权威最具独创性的品牌。

没有秘书处的情况下，如何去评定每个国家的兑现率和付出力？柯顿和团队在每一届峰会时都会形成两份问责报告，一个是峰会期间报告，另一个是最终报告。期间报告测量涵盖每年1月1日开始到成员国交接日的时间段，而最终报告是完整一年的评估。政府自身的政策体现、国家公务人员的调查反馈、国家内部官僚机制的审核、资金与资源调动和新政策的执行都是主要的数据库内容。柯顿力求每一份报告都能独立完整的回答了三个问题：一是各个成员国兑现承诺的程度和环境。二为各个国家在长期完成兑现承诺的过程中是否有一个规律存在，并且指出哪些因素可能影响规律；最后综合成员国的表现总结出一些可能造成兑现程度高或者低的原因。柯顿审查后发表的问责报告长度常常达上百页，而其全面性、准确性和前瞻性也使之成为了各国领导人人手一份的官方对照文档，英国前首相卡梅伦、德国总理默克尔等都曾公开赞誉并引用。整份报告也成为了一双无形的手，推动着G20议题的执行。

### 中国的探索者：不要简单迎合西方主流思想

1999年，柯顿到深圳参加一场国际学术会议，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柯顿回忆说，“我离开加拿大时就有人提醒我在中国有些餐馆会卖蛇肉，但是当我在中国吃第一餐时，真的看到有蛇在饭店外的笼子里面爬来爬去，我还是震惊了。”

在与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专家频繁交流沟通之后，柯顿坦言，“中国给我的惊讶，远不止是吃蛇肉”。柯顿发现，中国学者对本国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都能够客观有效地作出回应。不同于西方学者，中国学者的自省多于纯粹批判，很多时候更愿意公正评估其他国家并重视和谐发展的平等理念。

中国成了柯顿研究的20个国家中的一员，“客观公正地评估各国在国际平台上的表现是我们的一贯宗旨”。2013年，柯顿受聘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两年后，柯顿又加盟了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他的《全球治理与二十国集团》一书在2015年被翻译成中文。随着杭州峰会的召开，《G20中国：2016杭州峰会》的中译本也在计划中，对中国的研究更为接地气。

但是，他对中国的批评也并未减弱。柯顿强调中国学者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特色观点融入固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与体系中。“中国不能简单地迎合西方主流学术，被美国主导的西式思维所桎梏。”中国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历史沉淀必能培育出更有生命力和原创性的学术理论。

采访时，Skype视频中上海深夜的绚烂霓虹与加拿大早晨八点的阳光隔着一整片太平洋和十一小时的时差隔空“凝望”。柯顿在屏幕那头把近期出版的《中国在G20中的领导力》展示给我们看，“我把这本书献给自己刚刚出生的孙女凯洛特”，停了一下，他补充说，“也感谢正在崛起的中国”。

(李念指导)

个独立的G7研究中心。在柯顿的积极响应和带领下，多伦多大学迅速建立了G7研究中心，成为了第一个对七国集团进行全面系统且公正客观研究的独立非政府机构。基于该研究中心所进行的一系列调研，柯顿在1992年至1993年任职于加拿大外交部的特殊项目小组，作为环境和经济圆桌会议的一员筹备1995年的G7峰会，为其提供政策建议和咨询。在2008年秋天，柯顿的研究中心更引起了美国的注意。G7研究中心不仅被美国邀请一起组织了高水准的政府和学界研讨会，也参与了在华盛顿召开的G20峰会的准备工作。此后，在每次峰会的筹备阶段，柯顿都会受邀成为加拿大政府高级顾问。但在峰会召开的阶段，柯顿都会选择远离媒体的聚光灯回到幕后，作为第三者观察每个成员国的表现，“这样我才能保证自己做出最中肯的判断”。

### “Mr. G7”的美名和几大纸箱资料

在这些硕果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一系列繁琐工作。由于研究中心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倚仗网络上的信息收集，许多对相关国家的政府系统和语言文化熟悉的学者们必须为此投入极多的时间。“但是如果在做了大量的收集工作之后，我们依旧无法从繁琐的数据背后提炼出一国行动的逻辑来解释其行为动因，那我们应该是应该以该国行动无明显范式来结束研究还是应该继续，原因是我们还没收集到足够的资料才导致信息缺失。”在问及工作中遇到的挑战时，柯顿在太平洋彼岸如此描述。对于柯顿而言，在屡屡碰壁后如何调整研究方向和自身心态是关键。正是出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科研态度，柯顿的研究中心对于历届的峰会资料都事无巨细地保留着。大到峰会的主要议题，小到记录了峰会元首午餐的餐单，汇集在一个个大纸箱里的文件与资料涵盖了峰会的方方面面，几乎可以完美还原出开会当天的场景。这种仔细与细心使得柯顿在业界备受认可和尊敬，更让他获得了“Mr. G7”的美名。

自G7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当初满怀热情开始投入全球治理的团队其实只剩下了柯顿一人。柯顿的